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ISSN 1007-2101, CN 13-1207/F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作者： 王瑶，郭冠清
DOI： 10.14178/j.cnki.issn1007-2101.20231127.001
收稿日期： 2023-09-08
网络首发日期： 2023-12-28
引用格式： 王瑶，郭冠清. 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J/OL].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https://doi.org/10.14178/j.cnki.issn1007-2101.20231127.001>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王 瑶¹, 郭冠清^{1,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两种制度类型: 一是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并以“大市场+小政府”为特征的西方制度, 二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并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为特征的中国制度。西方社会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党政治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相比之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集中制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体制根源。

关键词: 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 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 政企合作

中图分类号: F123.9 **文献标识码:** A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两种制度类型: 一是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并以“大市场+小政府”为特征的西方制度, 二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并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为特征的中国制度。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所创造的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 是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突破, 又完全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看得见手”的理论。^[1]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2]

关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发表文章上做过深刻的分析^[3], 也有许多学者做过论述。本文试图从比较的视角论证,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党政治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使得西方社会不可能做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一、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理论边界

关于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理论边界,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和

“守夜人”理论为基础, 主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大市场+小政府”模式, 它主要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计划调节”为理论基础, 经过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及理论完善, 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理念。后者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从实践来看, 中国的经济转型便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

(一)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源自以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传统, 经过边际革命形成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体系, 还包括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形成的以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经济行为主体在自利动机驱动下通过自由选择和自愿交易而增进双方利益的自动自发行为。市场机制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和协调分散的决策而使整个经济趋于均衡。具体地说, 在市场经济中, 价格由供求决定又调节着供求, 因此, 只要价格有足够的弹性, 能够充分反应供求的变化, 那么, 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可以自动实现平

收稿日期: 2023-09-08

作者简介: 王瑶 (1981-), 男, 辽宁朝阳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博士; 郭冠清 (1967-), 男, 河北邯郸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衡,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则只是暂时的现象。市场机制运行的动力源自行为主体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市场既是增加个人财产的必要手段,也能塑造人们勤劳、节俭的品质。市场机制具有四种功能:一是传递信息和利用知识,特别是,市场机制能够保证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掌握的“默会知识”^①;二是提供激励;三是分配收入;四是自动清除(优胜劣汰过程)。

基于上述分析,在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上,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政府是无效的,因此,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必须削弱甚至取消政府的作用,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主张大市场、小政府、私有化。需要指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种立场是建立在市场主体是相互独立的个体与政府是利益集团代表、二者之间具有内在冲突的基础之上的。^{②[4]}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即使认为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也对政府干预持有怀疑态度。换言之,其“小政府”或“有限政府”思想是对亚当·斯密的政府“守夜人”原理的回归,该原理整体上将政府的职能锁定在“保护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这一最低限度层面。就像诺奇克所指出的,“能够得到证明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国家,其功能仅限于保护人们免于暴力、偷窃、欺诈以及强行履行契约等等;任何更多功能的国家都会侵犯人们的权利,都会强迫人们去做某些事情,从而也都无法得到证明;这种最低限度的国家既是令人鼓舞的,也是正当的。”^[5]

关于市场与政府之间作用边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私营部门在提供社会服务、促进经济增长和和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需要限制政府的行为。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整个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规模巨大的私有化浪潮,并逐渐扩散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其方法是将财产所有权由公共所有转化为私人所有和出售国有企业。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引发的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

数而实现。”^[6]因此,国家调控对稳定经济便起到重要作用。^{③[7]667}除此之外,国家本身就是人们通过合作达成基本认同的共同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而政府则是组织力量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的事务性机构,它能够完成家庭、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不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国家在保护幼稚工业和赶超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赫尔曼不无夸张地指出,如果没有政府对弱小工业的保护,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经济的腾飞,也没有一个国家能从经济落后向现代化转变。^[8]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源自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市场经济基本矛盾。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和分工为基础产生的,分工和私有制不可避免产生了以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基本矛盾。这一矛盾一方面内生出了否定市场经济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例如,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自由竞争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从而加剧社会的冲突与对抗并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自由竞争的结果还不可避免会产生垄断,而垄断又反过来会妨碍甚至消除竞争以致瓦解市场经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会引发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个别企业有组织的生产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会导致生产和消费的脱节以及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衡。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弊端本质上源于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要克服这个矛盾,就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的作用有其局限,但是政府的作用仍然是克服市场经济弊端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9]172}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边界总是在不断变化,很难找到效率的边界,这种关系变化的实质由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10]例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对应的是斯密所主张的政府“守夜人”角色,垄断资本主义一般对应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关系存在三个维度:一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二是国情和生产力所处的发展阶段,三是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9]221} 对于第二个维度,有限政府适应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所采用的三权分立的权利制衡宪法政治体系,它因严重制约政府的职能承担和运行效率而无法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任务。因此,以发展中大国以及二元经济结构为特征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无疑会使“有为政府”成为我国的合理选择。就第三个维度而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政府的角色不可能仅仅是“守夜人”或“最低限度的政府”,虽然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也是变化的,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存在着效率的边界。^[11]表1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市场和政府关系转变的历史进程。^[12]

表1 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的重大历史事件

时间	重大会议或事件	主要内容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1982年	中共十二大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7年	中共十三大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1989年	十三届三中全会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1992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
1992年	中共十四大	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	确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020年	十九届五中全会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有为政府来进行组织和推动,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市场经济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政府在整个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二、西方社会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在市场和政府的功能界定上之所以有截然不同的主张,根本原因在于:首先,迄今为止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暴露出了严重的失灵问题;其次,不同经济学家在如何看待两种失灵的原因及其严重程度存在明显的分歧。^{[13]2}因此,要理解和解决中国特色的有为政府和西方社会的有限政府之争,关键就在于能够全面审视现实世界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及其造成的问题。

(一) 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包括微观市场失灵和宏观市场失灵。微观市场失灵是指市场体系不能够按照资源的最优配置提供最合意的或最优的水平商品^[14],宏观市场失灵是指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而难以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微观市场失灵包括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以及信息不对称,它们由于破坏了帕累托最优的前提条件而导致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垄断造成效率损失的原因有二:一是垄断者为了获得和维持垄断利润可能会从事一种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例如,大厂商向政府官员行贿,或者雇用律师向政府官员游说等。二是垄断势力的存在会导致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产生“囚徒困境”的非效率结果。外部性,又称溢出效应,是“个体或厂商的活动对其他人或其他厂商的外部影响。”^[15]例如,一个吸烟者的行为危害了被动吸烟者的身体健康,但他并未为此而支付任何东西。在存在负外部性的情况下,私人活动的水平通常要高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公共物品因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与其占有的排他性而无法避免其他人的“搭便车问题”。公共物品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正外部性,出于道德风险的考虑,私人活动的水平通常要低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机制本身不能够生产足够的信息并有效配置它们,结果往往导致市场出现“逆向选择”问题。

宏观市场失灵主要归因于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源于银行业的固有风险以及风险的人为放大机制。银行业的本质特征是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靠短期借款(低风险与低利率)和长期贷款(高风险与高利率)来实现利差盈利的。准备金通过减少银行资本存量的波动来降低破产的可能性,但却无法消除基于现实或者想象的对银行破产的担忧而出现挤兑风潮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银行业的显著特征是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投资银行、对冲基金、抵押贷款发行人及其他金融企业隐匿了可能有助于竞争对手的商业战略信息,而且尽量避免披露有关自身境况的不利信息。再加上金融监管机构缺乏监管新型金融衍生品的法律职权,因此显示金融体系风险程度的信息就不可能被完全披

露出来。所以,一国金融体系与整个经济遭遇危机的风险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爆发金融危机。

(二) 政府失灵

微观政府失灵主要基于俘获理论。该理论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服从规则的人俘获了规则的制定者。在这种意义上,不是政府要管制企业而是企业需要政府管制,因为管制可以使企业在动态竞争的风险中得到保护。事实也正是大企业为了规则的制定而游说议员。受管制的产业能够成功地俘获公共利益的保护人可以用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作出很好的说明。奥尔森的集团思想可以概括为:小规模的组织往往比大规模的团体具有更强的政治活动力。这是因为,首先,小团体往往更具凝聚力(相对来说,组织活动、募集基金、散布各种信息在小团体中都更容易进行)。其次,小团体中的每个成员进行政治投资是非常合算的(因为成功后获得的收益特别大)。俘获理论演绎出的一个推论是,管制有利于生产者群体(因其是偏好明显的小利益集团),却牺牲了消费者群体(因其是偏好不甚明朗的大利益集团)。此外,规则的制定者常常与规则的服从者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巴克霍尔兹所言,“国会委员来自于私人部门,而在任期结束后又返回到私人部门。交朋友是赚钱的一条路线。例如,‘不履行法律责任的美国州际贸易委员会’是一个保持货车运输产业舒适安逸的联邦机构。”^[16]

宏观政府失灵主要在于相机抉择的时滞效应。首先,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政府不具有要求用来引导相机政策的调整形式的知识和信息,因此行动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更可能使得非中央集权化的市场经济变得不稳定,而非稳定。^[17]对于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缺乏成功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和知识。经济的未来走向很难预测,更不用说去把握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的时间和程度,因为货币政策只有在经历了一个易变的、长期的时间滞后才能作用于经济。^[18]对于财政政策,财政扩张(即货币供给没有任何适应性变化的扩张)在长期会挤出或取代私人支出,因而对总需求、收入以及就业水平的作用较小。特别是,实践证明,财政政策作为一件宏观经济工具,并不如货币政策来的灵活,因为,超越反周期考虑的其他社

会目标以及立法部门的迟延,使得政府不能应总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支出计划或税法上作出及时调整。概言之,时滞效应会导致宏观政策失灵。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到认识到错误再采取纠正行为时,损失可能已经造成,纠正行为本身变成了进一步的错误”。^[19]

(三) 西方制度的失灵根源

西方制度失灵首先源自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缺陷。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受到华盛顿共识强力支持的私有化曾被广泛认为是全面经济转轨的核心原则之一。然而,私有化容易导致不公平,市场化运作本身以及民主政治进程也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西方经济学家对中东欧(CEE)和独联体(CIS)的私有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在CEE和CIS国家发生的国有企业向国内所有者的私有化转轨——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之一——并不像预期那样对经济绩效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20]⁹⁰激进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更多的是长期而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例如,直到2000年苏联东欧人均收入才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21]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政府失灵导致私有化浪潮迭起,但私有化又引发了市场失灵问题。^[20]⁹

西方制度失灵还源自政党政治的弊端。西方社会的政党政治是一种缺乏中心的党争政治,它由于无法克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致使西方国家无法形成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22]¹⁸⁵具体地说,政党政治的特征是有民主而无集中并且党争激烈。这使得西方国家软弱的有限政府无力整合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目标失范与国家一盘散沙的局面。此外,西方民主实际是一种被简化了的程序民主,这使得一个政党制定一个方针政策,另一个政党就会找出各种理由反对和否定。这种党争政治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还会使选民的整体利益严重受损。

总之,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政党政治是造成西方制度失灵的根源。就像张维为等国内学者所总结的那样,“私人部门把持着与国家命脉相关的工业产业,资本高度集中在少数资本家和上流社会精英手上。而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又给予私人资本家通过操纵竞选来直接摄政的机会”,结果便是,“微观激励逐渐失效,中观结构先天失衡,宏观方向完全丧失,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面对范式级

别巨变的冲击时面临的严重困境”。^[23]

三、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西方国家的“大市场+小政府”模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政党政治的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对立性。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市场与政府的一致性。

(一)有效市场的形成前提

有效市场形成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1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它显著区别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资本成为了支配各个领域的“普照之光”^{④[24]},资本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具体地说,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既体现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之中,也体现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既体现在微观层面,也体现在宏观层面;既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此不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宏观全局的角度要求政府或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要求国家必须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合理配置资源,保证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率。^{[9]173}

对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作用,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它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分配正义的有机结合^{⑤[7]724},另一方面它还是迈向共同富裕和促进个人自由发展的保障,“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7]814}正如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5]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中国特色”成分包括依靠政府管理经济、依靠经济绩效考核官员等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包括中国党和政府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制高点,拥有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部分非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免权和发展战略决定权等方面;“市场经

济”成分主要是指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价格,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以上三种成分共同作用,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26]概言之,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结合,它既要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也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这种“宏观整合力”是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既包括了国家对土地、金融、大型骨干企业的控制权,也包括了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二)有为政府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国家本质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西方国家选举制下的执政党不过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实现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统一。^[10]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弊端在于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将普通公民具体的利益变成了抽象的党派利益,把普通公民的民主权利归结为每过几年才履行一次的投票权,实际上否认了这些具体的人有权以这些利益直接的、真正的代表身份出现,并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此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党竞争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集团,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冲突,阻碍了共同利益和集体意志的实现,影响公共政策的效率。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其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22]72-73}从制度传承来看,它延续了中国古代朝廷的集议制度,包括廷议、宰相议、百官议、朝议等许多具体的做法,也借鉴和发展了苏联模式中的民主集中制和五年计划的制定。^[27]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民主集中制是新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政治基础和逻辑起点,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统一领导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国家经济调控能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由于能够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使国家能够自主制定有利于经济目标实现的方针政策,并能够把握住既定的发展方向。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另一方面,我国政府拥有较强的政策执行能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与党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力有很大关系的。正如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关于党领导国有企业的论述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现代

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28]由此可见,在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下,我国不会出现西方社会那样的政府失灵。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西方国家对经济进行有限干预的“软政府”特征,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限政府由于被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绑架而执行能力极弱。相反,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强势政府”特征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派生出来的。此外,中国的有为政府还源自支撑它的党政体制,即,党发挥核心和领导作用,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发挥职能作用。基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英国和美国等西方社会把政府视为“必不可少的恶”,而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将政府视为“必不可少的善”。^[29]此外,就国家观而言,英美的国家观属于“个人主义国家观”,而中华文明的国家观属于“整体主义国家观”。^[30]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特色的有为政府与西方国家的有限政府主要有如下几点区别:一是西方国家的有限政府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而中国特色的有为政府是以人民为中心以致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二是西方国家的有限政府侧重于短期的总量平衡,缺乏长远目标和规划;中国特色的有为政府强调经济发展长期性和连续性,而不局限于短期经济目标。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需求管理,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供给管理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有为政府还体现在党的领导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显著特征,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有限政府所不具备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就是因为我国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注重顶层设计和跨周期的政策设计,进行科学的预期宏观管理,及时进行宏观调控,合理地引导市场,防止短期冲击变成趋势化冲击。^[12]

(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中国实践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有效市场以有为政府为前提,有为政府以有效市场为依归。实际上,由市场失灵可以直接推论

出有为政府的合理存在:市场中的个体并不是平等的,从而造成交易结果的不公正;财产权利具有集中和集聚的特性,从而基于纯粹市场机制会产生马太效应;市场秩序往往是个体行为所汇成的公共选择结果,而个体的功利性和短视性往往会导向社会的囚徒困境;市场秩序中的过度竞争往往会诱致合作的解体,从而导向社会发展的内卷化和秩序扩展的中断;市场竞争的结果也只是产生能够更好利用特定规则和资源的优胜者,却并不是对社会发展有最大好处的优秀者……显然,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引入政府的积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得以出现并发展壮大的原因。^[13]²²⁰⁻²²¹

对于中西方两大制度体系,西方资本主义是私有制为基础和资本意志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为基础和国家意志至上。前文已表明,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政党政治”的经济理论,是导致西方社会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根本原因。就虚拟资本而言,金融市场的资本权势会造成“赌场型”利益分配结局。这是因为,金融市场的主控型投资者一方面可以通过控制资金的投放推高或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塑造市场预期,另一方面还能够通过控制舆论等改变一般投资大众乃至全社会对投资准则的看法。这样,那些拥有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可以人为地干预市场走势来放大甚至制造价格涨落的泡沫,通过引导散户的投资决策来为自身谋求暴利。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软政府和有限政府,中国的强势政府和有为政府可以作为实质性的主体参与到金融市场之中,通过建立政府可掌控的金融团队,与主控型投资者以及国际资本力量相抗衡从而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的价格稳定。例如,中国政府可以制定规范资本市场信息发布与传播的制度,严格审核评级公司和资产评估机构的行为。在二级市场,逐步利用社保基金等资金池,发展政治素质、专业能力过硬的机构性投资主体,促进股票市场发挥其对企业价值的筛选而非投机作用从而抑制资本的“脱实向虚”取向。

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只能造成西方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旨在实现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可以肯

定,中国现行的经济所有制和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是中国较好地适应财富分配需求的制度优势。今天的中国政府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高度重视,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使各不同地区的贫富不均得到很大缓解;还通过精准扶贫,已实现全面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未来,中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财税改革,尽快加大直接税的征收,尤其要开征财产税和提高资本利得税,以建立累进性更强的税收结构,增强对国内消费和产业升级的激励。

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特征可以描述为“中央集权,地方代理,资源国有,官员任命”。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是将地方GDP增长率作为关键性指标的官员晋升制度,这实际上是通过地方官员的政治竞争去带动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我国的党管干部原则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本质上是由中央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表现任命的,这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与现代企业极其相似。中国政府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正如同一个公司的领导层。对地方政府官员而言,当地的经济表现是事关自身晋升的关键依据。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济业绩便是官员晋升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多年来,这一标准的重要性日趋突出。中国地方政府涉入地方经济既深又广。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在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上相互竞争,以寻找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具体而言,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中国得益于人口规模而迅速形成产品市场,但受制于计划经济以及国有经济的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影响,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使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工业园区(为招商企业提供便利的劳动力、银行贷款服务等)来弥补中国要素市场组织能力相对欠缺的不足,这使得原本功能相对落后的要素市场得以有效运作。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意味着中性的政治权力嵌入市场经济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于中央政府的绝对政治权威与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的有机结合并通过区域之间的相互竞争带来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运作模式。我国政企之间的合作表现在地方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地方官员锦标赛式的晋升这两种效应。政企合作不仅有利于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而且可以推动地区产业政策的动态演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31]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其发展壮大既能为当地政府创造税收收入又可以通过推动城市经济繁荣而实现经济增长。同样道理,地方政府也以区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制定各种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总而言之,政企合作是一条能够体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中国特色道路。

注释:

①默会知识属于一种特定的、分散的个体知识。它包括技巧、领悟能力、偏好、预期、判断等。

②弗里德曼的评论最具代表性,他总结到,“不存在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对自由市场的全面利用的替代物……这是因为政府旨在解决这类外部事物的种种努力,结果却一成不变地是坏处多于好处。尽管如此,但原则上我们不能否认:在某种情况下,存在着进行那种干预的必要。”

③马克思曾指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

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著名的“普照之光”论断:“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⑤马克思指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且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参考文献:

- [1]陈云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J]. 经济研究,2019(1):4-19.
- [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4.
- [3]习近平. 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J]. 东南学术,2001(4):26-38.
- [4]密尔顿·弗里德曼. 市场机制与中央经济计划[M]//弗里德曼文萃. 高榕,等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38.
- [5]罗伯特·诺奇克.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 姚大志,

-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1.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1.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N].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56-59.
- [9]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10]赵峰,周慧珍.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J].学习与探索,2021(6):86-97+196+2.
- [11]方福前.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新时代的经济体制双向改革[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3):71-81.
- [12]沈坤荣,施宇.中国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经济增长质量[J].宏观质量研究,2021(5):1-15.
- [13]朱富强.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有为政府的理论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4]DAVID W. PEARCE. Th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c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271.
- [15]胡代光,周安军.当代国外学者论市场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
- [16]托德·巴克霍尔兹.已故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新解读[M].杜丽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43.
- [17]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M].余江涛,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67-168.
- [18]《经济学家》主编.21世纪的经济学[M].徐诺金,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109-110.
- [19]密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M]//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第三版).孙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2004:262.
- [20]热拉尔·罗兰.私有化:成功与失败[M].张宏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21]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5.
- [22]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23]张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74.
-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09.
- [25]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64.
- [26]FAN J, MORCK R, YEUNG B. Capitalizing China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1:No. 17687.
- [27]张维为.文明型国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63.
- [28]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48-149.
- [29]杨春学.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基于政府竞争与企业之间关系的一种考察[J].财经问题研究,2012(10):3-8.
- [30]杨春学.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视野[J].经济纵横,2018(1):19-21.
- [31]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J].社会,2018(2):1-45.

责任编辑:武玲玲

“Efficient Market + Promising Govern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A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bstract: There are two main types of system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today: One is the Western system influenced by neoclassical liberal economics and characterized by “big market + small government”. The second is the Chinese system guid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economics and characterized by “effective market + promising government”.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 in Western societies are rooted i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at combines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party politics. In contrast,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combin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democratic centralism are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effective market and promising government.

Key words: efficient market; promising government; market failure; government failure; government-enterprise cooperation